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献研究成果·

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出土金文文献史料价值发微^{*}

樊 森 邹笑都

内容摘要: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出土金文文献史料价值巨大。其中曾侯𢆶方座青铜簋铭为系连曾国世系、破解曾国始封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曾侯谏鼎等大批曾侯器的出土,不仅将曾国政治中心的研究时段提前至西周早期,而且为曾、噩两国相对位置的确定找到新的文献依据。斗子鼎可帮助确定成王“岐阳之盟”的时间和诸多细节,填补史书缺环。

关键词:叶家山曾国墓 金文文献 曾国世系 曾噩关系 岐阳之盟

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是201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从2011年至2013年间,该墓地遗址出土了大批西周早期曾国文物^①,这批珍贵文物对于研究西周早期汉东诸国关系,特别是曾国早期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从曾国世系脉络、曾国政治中心所在、曾鄂两国关系等方面对这批金文文献的史料价值略作探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提供了系连曾国世系的重要线索

虽然曾国出土器物数量众多,但曾国历史一直未载于史籍。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让世人了解到战国早期曾国文化的丰富灿烂。然而,曾侯乙祖先其人、始封时间、曾国世系等却成为学界长期聚讼难解的问题。2013年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M111“曾侯𢆶”铜器的发现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线索。

根据M111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规格,特别是多件含有“曾侯𢆶”字样的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商周金文字词集注与释译》(13&ZD130)、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007年以来新见殷周有铭铜器的整理与研究》(11CZS004)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叶家山西周墓地》,《考古》2012年第7期等。

铜器,可判定其墓主应是西周早期的曾侯罔^①。墓中一件方座青铜簋铭作“罔作刺(烈)考南公宝尊彝”,根据铭文,此器应是曾侯罔为其父辈“南公”所作的祭器。

文峰塔春秋晚期曾侯臚墓(M1)出土编钟M1:3正面左鼓部铭文开头七字铭作“臚曰:余稷之玄孙”;编钟M1:1正面钲部和左鼓的铭文系连后为“隹(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臚曰:白(伯)括上庸,左右文武。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此淮尸(夷),临有江夏。周室之既庠(卑)……”^②。从这两件钟铭中可以得到有关曾国族属的重要信息:曾侯臚称自己为后稷的子孙,那么曾侯臚所辖曾国应为周王室同姓诸侯国;曾侯臚先祖南公曾经辅佐文王武王,在灭殷之战中建立功勋,后受命于王,营建城池,统辖淮夷,监视江夏。

综合曾侯臚钟和曾侯罔方座簋两器铭文,我们可以对随地曾国的始封原因和世系做出如下判断:随地之曾应为姬姓,其受封时间大约在西周成康时期^③,受封原因即为史书记载的分封建制、以蕃屏周(此为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文献《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的又一例证)。而曾国封国后,其世系绵延数百年,从叶家山西周早期的曾侯谏、曾侯罔到文峰塔春秋晚期的曾侯臚,再到擂鼓墩战国早期的曾侯乙,文峰塔战国早期的曾侯丙,该姬姓曾国始终统辖着以随州为中心的汉东区域,成为《左传》所载“汉阳诸姬”的重要一支。

因此,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文献的重要价值之一就在于其为初步系连曾国世系提供了西周早期的史料依据。黄凤春先生根据孟鼎铭文中“南公”即为西周重臣“南公适”的判断,对方座簋铭文中曾侯罔称之为“刺(烈)考”的“南公”进行身份判定,认为二者实为一人,而称“南公”为“考”的曾侯罔与称“南公”为“祖”的孟应该是同系但不同辈的叔侄关系;考虑到叶家山西周墓地存续的时间仅限于成康昭三世,那么曾侯谏与曾侯罔极有可能为兄弟及关系^④。方勤先生从考古学角度对随州叶家山、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垅、随州义地岗和擂鼓墩等地出土器物铭文中的曾侯进行了编年序列^⑤。综合二位先生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将曾国诸侯世系排定如下:

①黄凤春等:《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二期考古发掘再获大批西周青铜器》,《中国文物报》2013年10月25日第008版。

②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臚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③黄凤春、胡刚:《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兼论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第2期。

④黄凤春、胡刚:《再说西周金文中的“南公”——二论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的族属》,《江汉考古》2014年第5期。

⑤方勤:《曾国历史的考古学观察》,《江汉考古》2014年第4期。

商末 周初	西周 早期	西周 中期	西周 晚期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战国 早期	战国 中期
南公适	曾侯谏、M28 或 M65 墓 主、曾侯魫	不详	曾侯絳 伯	郭家庙 M21 墓主、苏家 垅墓主	曾侯宝、 曾穆侯、 曾侯旻	曾侯腆、 曾侯郈	曾侯乙、 曾侯丙	不详

二、提供了确定曾国政治中心的核心环节

对于史籍乏陈的曾国,考古遗迹发现范围及出土文献成为确定其疆域和政治中心的重要依据。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刘节先生就曾通过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墓出土的曾姬无卣壶等器物铭文,判断“自东周中叶以迄战国晚期,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南阳,东抵睢州,皆其范围也”^①。近年来,张昌平先生统计了自 1966 年到 2008 年间有明确出土信息和共存关系的 32 批曾国青铜器,发现其主要分布地除湖北随州、枣阳一带外,还见于湖北京山、襄阳,河南淅川、新野、桐柏、潢川,以及江苏六合等广大地域。但这些出土地并非全部属于曾国的统治区域,曾国的疆域应该是与涑水、漳河和滚河三个不同水系划分出的三个彼此独立的地理单元有关^②。在张先生的文章中,他将曾国政治中心的研究时段提前至两周之际,但囿于材料,曾国在西周时期的统治中心仍不得而知。

而随州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发现,以及标志墓主身份的“曾侯谏”、“曾侯魫”等大批有铭铜器的出土,则可以再次将曾国政治中心的研究时段提前至西周早期,这也为观察曾国疆域的变迁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我们在张昌平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最新考古成果,列出曾国铜器群的主要出土区域分布表。

	西周 早期	西周 中期	西周 晚期	春秋 早期	春秋 中期	春秋 晚期	战国 早期	战国 中期
随州涑水中上游	叶家山	不详	均川熊家老湾,安居桃花坡	城区北黄土坡,万店周家岗	刘家崖,义地岗	文峰塔,东风油库,刘家崖,安居汪家涑	文峰塔,刘家崖,擂鼓墩	刘家崖,擂鼓墩,文峰塔
枣阳滚河中游			郭家庙	熊集镇段营,郭家庙				
京山漳河上游			坪坝镇檀梨树村	苏家垅				

①刘节:《寿县所出楚器考释》,载《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 年,第 108-140 页。

②张昌平先生指出:“带有曾国铭文的铜器并不能代表同出的整个铜器群均属于曾国铜器,出土地域当然也未必一定属于曾国疆域,而是需要具体分析其文化背景。我们的考虑是:如果在某区域发现有性质明确的典型曾国铜器群(如苏家垅),或者带有曾国铭文的铜器在某时间段有多次出土,则该区域相关时期应当属于曾国疆域,出土的其他铜器群也可视为曾国铜器。”详见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发现与曾国地域》一文,《文物》2008 年第 2 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获取如下信息:其一,出土器物铭文中含有“曾侯”字样的墓葬主要集中于随州涑水流域^①。其二,在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发现之前,由于曾国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势力范围十分广大(广泛分布于随州涑水中上游、枣阳滚河中游和京山漳河上游三大区域),所以我们很难判断其早期政治中心何在。其三,尽管目前尚未发现西周中期的曾国墓葬遗存,但随着叶家山西周早期墓地中大批“曾侯”铜器的出土,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找到曾国崛起、兴盛的脉络,看到其在随州涑水流域的统治世系自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始终因袭相承,从未中断。

综合上表及曾侯烝方座簋铭(烝与“南公”的关系)和曾侯𠙴钟铭(𠙴对先祖南公“左右文武……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的追思),我们可以蠡测:曾国自西周早期南公受封,即在随州漂、涑二水相汇之“汭土”处营修城池,组建邦国,而这“汭土”的所在,正是距离叶家山墓地仅1公里处的庙台子遗址^②。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对庙台子遗址进行考察,发现了同为西周早期的大型聚落群(约30万平方米),以及周边的环壕、城墙等防卫工程遗址,现已基本可以确定庙台子遗址应为叶家山墓地的匹配遗址,是西周早期的曾国政治中心。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肩负替周王“君此淮夷,临有江夏”重任的姬姓曾国,一方面在辅助周厉王灭彘的战争中趁机占领疆国土地,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向西扩展到襄阳枣阳地段;另一方面为周防楚,向南拓展其疆域至京山坪坝地区。而到了春秋中期前后,随着周室的逐渐没落,南方楚国势力的强力东扩,失去“靠山”的曾国不得不渐渐退出了京山漳河和枣阳滚河流域,仅将势力范围留存于其原始封地随州涑水流域。

三、提供了辨析“曾”、“噩”关系的关键证据

随州地处随枣走廊的要冲,一直是学界研究西周汉东方国格局的枢纽地段。这里是文献记载的随国地域,却出土文献未载的曾国铜器,2007年随州安

①对于曾国铜器铭文中“侯”、“伯”、“子”不同爵称同地出现的特殊现象,学界多有讨论,该问题非本文讨论重点,此处仅观察出土器铭中含“曾侯”字样的墓葬所在地。随州涑水流域的叶家山墓地出土有西周早期的曾侯谏器、曾侯烝器;文峰塔墓地出土有春秋晚期曾侯𠙴器和战国早期曾侯丙器;东风油库墓地出土有春秋晚期的曾侯𠙴器;擂鼓墩墓地出土有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器;此外,义地岗失窃文物中又发现了春秋中期的曾侯宝器。枣阳滚河流域的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出土有西周晚期的曾侯烝伯器。京山漳河流域的苏家垅墓地出土有春秋早期的曾侯仲子旂父器。

②对于曾侯𠙴钟铭中“汭土”的理解,陈伟先生引韩宇娇先生观点,认为“‘汭土’可以理解成是两条水系汇合之处。很可能是西周早期曾国都城所在的随州庙台子遗址位于漂水流入涑水的汇流位置,西周晚期到战国时期的义地岗墓葬群和擂鼓墩墓地位于涑水与涑水的交汇处。曾国早期都城地墓葬的位置正符合上文中的‘汭土’含义”。详见陈伟《曾侯𠙴编钟“汭土”试说》一文,《江汉考古》2015年第1期。

居羊子山甚至还发现了噩国公室墓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矛盾让随地西周方国格局的研究显得更加错综复杂。

因为在2011年以前，随州境内出土的所有曾国青铜器均不早于西周晚期，而西周早期噩国铜器却被多次发现^①，故有部分学者推断，随州之曾国可能是周厉王剿灭噩侯反叛后所封之国，并据此将中甗、静方鼎等铜器铭文中的“曾”理解为“噩”国地名^②。2011年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地的发现，使学界认识到曾国自西周早期已存在于随地，是一个从西周早期绵延至战国中期的汉阳大国，从而开始对中甗、静方鼎等铜器铭文中的“曾”字进行重新解读。

中甗铭文曰“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曾……中省自方、登……在噩师次……”，是说王南巡时，命中先巡省南国。在这个过程中，提到了曾，也提到了噩。静方鼎铭曰“王在宗周，令师中罢省南或（国）……王在成周太室，命静曰：‘俾汝司在曾噩师。’”也提到了曾，提到了噩。两件器铭讲的均是“省南国”的过程，也都提到了曾和噩，由此可见“曾”不仅不是地名，也非部分学者所认识的灭噩后才新建的封国，而应是西周早期就已与噩并存于南国地界的诸侯国，这正与目前所见的考古材料相符合。根据考古发现，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在随州境东，羊子山西周早期噩侯墓地在随州境西，二者间直线距离约20馀公里。依照周初诸侯国公室墓地一般都距离其行政中心不远的习俗，确定了曾噩墓地间的相对距离，也就基本确定了曾噩两国的相对距离。

曾、噩两国在今随州地界相对位置的确定，不仅为学界进一步研究西周王室对汉水江淮流域间的经略政策创造了条件，也为周王朝南土疆界的确定找到了新的依据。《左传·昭公九年》记载“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根据既往考古发现的结果，基本可以证实詹桓伯所说东土和北土边界的可靠性，但是对于其所言的南土边界，却憾于考古材料的缺乏，一直无法判断其真伪。而现在看来，詹桓伯的说法是不够全面的，他仅提及南土西部，而对南土东部至汉阳一带的领域却未曾言及^③。而事实上，根据中甗和静方鼎的铭文，位于汉东随地的曾、噩两国不仅是周王的南土之地，更是王师南巡过程中的重要军事据点。

四、提供了还原“岐阳之盟”始末的诸多细节

叶家山西周早期曾国墓葬出土了铭作“丁巳，王大袞。戊午，斗子蔑曆，敝白牡一。己未，王赏多邦伯，斗子丽，赏鬯卣、贝二朋，用作文母乙尊彝”的“斗子鼎”（M2：2）。该器铭文的史料价值在于其帮助确定了西周成王“岐阳之

①张昌平：《论随州羊子山新出噩国青铜器》，《文物》2011年第11期。

②参见李学勤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

③刘绪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

盟”的诸多细节和确切时间,填补了史书的缺环。

斗子鼎出土后,虽有部分学者认为该器属于武王时期^①,但大部分学者仍将该器定为成王时器。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分析其与成王时器保卣、保尊铭文间的联系。首先,该器铭文在内容上,与成王时器保卣、保尊铭文“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诞赐六品,箴曆于保,赐宾,用作文父癸宗宝尊彝,邁于四方会,王大祀祫于周,在二月既望”中记载的事件具有高度相似之处:活动均为“王大(祀)祫”;参会人员均包含“王”与四方诸侯,即“多邦伯”、“东国五侯”。其次,该器出土墓葬 M2 时代为西周成康之际^②,而斗子鼎器形与成王时器献侯鼎类似^③,这与成王时的保卣、保尊在时间上一致。再次,成王时期大规模的诸侯大会史书记载《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阳之蒐……”、《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据此基本可以判定斗子鼎铭文所记之“王大祫”与保卣、保尊铭文中的“王大祀祫”应是一件事,即西周早期成王大会四方诸侯的“岐阳之盟”。

尽管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有对该次盟会的记录,但却语焉不详,致使学界对于“岐阳之盟”的诸多细节仍不清楚。而斗子鼎铭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系连其与保卣、保尊铭文中的四个干支日期(“乙卯”、“丁巳”、“戊午”、“己未”),近乎完整的还原了“岐阳之盟”的全部过程。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保卣所记是周王‘大祀祫’时的情况,而当时王殷见东方诸侯,日在乙卯,这正是斗子鼎丁巳的前两天。看来周王在‘大祫’之前分别朝见各方诸侯,到丁巳日举行‘大祫’,再过两天对来朝诸侯进行赏赐,整个典礼才告完成。保卣所记是祭祀之前,斗子鼎所说是祭祀以后,两者合观,典礼的始末便大体清楚了。”^④

【作者简介】樊森,女,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

邹芙都,男,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秦汉史。

①陈小三:《新出荆子鼎与武王克殷的年代——兼论周武王时期的标准青铜器群》,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776。

②李学勤等:《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笔谈》,《文物》2011年第11期。

③李学勤:《斗子鼎与成王岐阳之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

④李学勤:《斗子鼎与成王岐阳之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